# 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革命动员思想

### 杨会清

(江西省委党校, 江西南昌, 330003)

摘要: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的革命动员问题进行了努力的探索,并初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土地革命为手段,以政治动员、征集新兵、筹款以及肃反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动员思想。这一思想,既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一个深入理解。不过,由于当时革命的不够深入,他对革命动员问题的思考也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关键词: 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 动员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1-0067-06

众所周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进行有效的革命动员。对此,日籍学者中野实曾经指出:"若要有效地发挥革命组织的作用以实现革命的目标,各种资源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组织或联盟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人力资源。但除此之外,资金、物资、武器等财力、物力资源与情报、通讯、宣传等信息资源也很重要。"[1][P30]事实上,真正的革命者往往都是非常重视革命动员工作的。对毛泽东而言,自然也不例外。自参加革命以来,他即对中国的革命动员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努力的探索,并于大革命时期初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革命动员思想。这一思想,对之后的苏维埃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革命动员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战争)准备阶段中的主要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已分子的处置等。"<sup>[2](201)</sup>实际上,上述各项工作也是革命动员中所应包含的内容,是一切革命者所必须面对的中心问题。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对其中的后四项工作给予了认真的思考与努力的探索。

所谓政治动员,即是指建立一个有利于革命的合理秩序以取代传统的自发秩序的过程。在这一期间,不仅要将各种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收拢、聚积起来,而且要将潜在的革命者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那么,革命者应以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呢?对于这

一问题,毛泽东是主张运用阶级斗争手段的。1925年 12月,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活学活用。他指出:地 主、买办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代表着中国的反 动势力;中产阶级,对革命具有一种矛盾的态度,特 别是在革命发生之后,他们会迅速地发生分化,或参 加革命,或进行反革命。其中,民族资产阶级是这一 阶级的主要代表; 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 主以及小知识阶层, 他们往往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 而进行理性的选择; 半无产阶级, 主要是指半自耕农、 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以及小贩等;至于无产阶级, 则是指产业工人。其中, 半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自诞 生以来, 即具有坚定的革命要求与决战心理。经过全 面的分析之后,他得出了以下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 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 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 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 级, 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 朋友。"[2](9)在分清了"敌""友"之后,革命者的第一 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 威风打下去, 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 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2](23)为此,毛泽东还特别 强调:"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 阀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中国的革命只有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3](38) 除阶级斗争手段之外,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土地分配在

动员群众中的作用。1926年9月1日,他在《农民问 题丛刊》的序言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 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 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 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解决农民不会拥 护这个革命。"[3](37)鉴于半自耕农和贫民为当时中国农 民的主体,因此,"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 题。"[2](6)要使他们支持革命,就必须首先满足他们的 利益诉求,这样,开展土地革命就成了国民革命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在这里,土地分配并非一个纯粹意义 上的经济问题, 而是引导农民支持革命的一个利益杠 杆,即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 益,必然会起来支持革命。1927年4月19日,他在 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要增 加生力军保护革命, 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 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 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 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 因农 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3](43)经过广泛的 阶级斗争与彻底的土地分配,接下来便是"广泛地发 动农民, 壮大农会力量, 特别是要把苦大仇深的农民 吸收到农会里来,由他们当家作主"。[4](198)当广大的 工农群众被组织起来后,以往一盘散沙的群众因此也 就能够形成巨大的战斗力。

所谓征集新兵,即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来扩大革命 的军队的工作。对于这一运动,毛泽东一直都是非常 重视的。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 苏俄在军事方面向 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支持。当然, 这也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参与军事工作的机会。 早在1925年1月,中共中央就指示各级党委道:在反 对地主民团的同时,要宣传并不断扩大农民自卫的组 织,并将这一组织控制在共产党的政治指导之下 [5](296)。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还指示党、团员要深入军 阀部队和国民革命军中秘密组建支部以争取其中下级 官兵。对于中央的这些指示,毛泽东不仅表示完全的 赞同,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 的"[6](58)的著名论断。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对当时湖 南的农民武装斗争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他指出:"建立 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 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 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 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2](29)实际 上,这一现象也给了毛泽东一个重要的启示,即:这 种地方武装不仅是维护当地革命秩序的重要力量,而 且也可以成为正规部队的主要来源,即形成一个由工 人、农民——地方部队(如梭镖队)——正规部队的扩

军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形成,则为之后我们党进行人 民战争创造了条件。

至于财政和粮食的准备,又称之为筹款,主要是 指筹集革命所需的现金、粮食、服装、武器以及其它 物资等的工作。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 经费的问题上主要是仰赖于共产国际的援助。据统计, 在 1921 年 10 月~1922 年 6 月间, 共产党所支出的 1.7655 万元, 其中就有 1.6655 万元来自于共产国际, 而自行募捐的仅 1000 元[7](304)。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形 成之后,国民党中央虽能够拨付部分经费以支持共产 党开展工农运动,但这一经费却往往不可靠。据当时 报刊记载:"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汪精卫提议 的农民运动的经费很多, 尤其是湖南方面, 汪要毛润 之负湖南农民运动责任并当农所所长,需要经费多大, 一定如数照拨。但汪走后,从三月至五月,农所的经 费便不可靠了。"[8](25)随着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毛泽 东发现开展农村革命也有助于经费问题的解决。像湖 南的农民运动,随着对土豪劣绅"清算"运动的开展, "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 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 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 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向为富 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 或作他用。"[2](24)这一发现,可谓是当时党内经费筹集 的一大创新,并为之后"打土豪"、"挖浮财"之筹款 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至于对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又称之为"肃反", 主要是指为稳定革命秩序而进行的内部整肃行为。早 在 1920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就提出了新民学会的创 立目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 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旗子立起了, 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9](554)实际上,毛泽 东这里所谈的是组织的纯洁性问题。我们知道,要保 证革命队伍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强调队伍内部的 纯洁性是非常必要的。而要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一是靠严密的组织, 二是靠深入的政治教育。自国民 党以武力"清共"之后,我们党内还较少有人去对革 命失败的原因、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 而毛泽东此时却明确地提出了整顿全党的建议,并强 调要"建立一个新的党——就是工农的党"[6](175)以克 服国共合作时期党员成份鱼龙混杂的现象。秋收起义 失败之后,毛泽东即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对剩余的 部队进行了整顿,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在部队中建 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并设 党代表), 营、团以上建立党委, 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

会统一领导。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去留自愿的原则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二个营七个连)。这样,"一方面巩固了部队,另方面也散布了革命种子,而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10](188)应该指出的是,"三湾改编"给中国之后的革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像"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它不仅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为之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组织上的借鉴。另外,通过内部整肃来统一队伍思想和行动的作法,在以后的井冈山"洗党"以及延安整风等运动都得到了相当的体现。

由上可见,经过这一时期的思考与探索,毛泽东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如何在中国进行革命动员的总体思想,即:以阶级斗争、土地革命为手段,围绕着政治动员、征集新兵、筹款以及"肃反"等内容来开展革命。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革命还不够深入,因此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不是很成熟,在这"四位一体"的内容之间也未形成一种积极的、互动的关系。

我们周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在许多方面接受了它的指导,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他在对革命动员问题的认识上或多或少地会存在着一些"国际"色彩。不过,这中间更多的是他根据中国国情对马列主义进行参"禅"悟"道"的过程。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阶级斗争不仅是人类 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而且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 唯一手段。1848年2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 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 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 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 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 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 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1](250-251)对此,列 宁亦表示完全的赞同。他不仅将它作为衡量马克思主 义者的重要标准,而且根据俄国的国情提出了在农村 开展阶级斗争的策略。他指出:农民阶级是不发达国 家开展民主革命所不可或缺的动力,要使他们成为一 支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 就必须以土地问题作为整个 农村战略的一个切入点。这是因为: 当农民获得土地 之后,他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勇敢作战

直至革命胜利[12](589)。这样,阶级斗争与土地分配共同 成为落后国家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手段。十月革 命之后, 列宁又将这一策略作为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 国际的一项基本条件。对此, 共产国际曾经于 1923 年5月指示中共道:"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 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 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 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 利。"[13](78)那么,如何使农民起来支持自己的革命呢? 共产国际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首先满足农 民阶级的利益诉求, 如没收地主和寺庙的土地并将其 无偿分给农民、歉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的征税制度 以及铲除旧官僚的统治等。实际上, 共产国际的革命 逻辑是:革命必须建立在最大多数群众需要的基础之 上。像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80%以上的落后国家里, 农民的利益即代表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农民的需 要自然也就是革命的需要了。因此,要解决革命的问 题,就必须解决农民的问题,而要解决农民的问题, 则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从马列主义理论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看,毛泽 东确实是借鉴了其中相当部分的内容, 但是, 彼此之 间的不同之处也同样的明显,而这又主要体现在革命 动员的手段问题上。对于阶级斗争的手段, 共产国际 曾于 1925 年 4 月指出: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残余势力 还很强大的国家里,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冲突极其尖锐, 因此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可能在一定的革命阶段 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同盟者。这种分析首先适用于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14](22)在共产国际看来,农村 中的阶级对立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但是,毛泽 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却发现: 在当时的中国农村 中,既有凭借势力称王称霸、践踏农民的土豪劣绅与 不法地主,也有对革命惶惑不安的富农。既有"上无 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农,亦有对革命态度游移 不定的中农。其中,贫农阶层处于当时社会的最底层。 由于受自身社会地位的影响,贫农往往具有破坏一切 的天性,因而成为农村中最革命的群体。有鉴于此, 毛泽东认为,要进行国民革命,就必须以贫农作为这 一运动中的先锋与主力军。他强调指出:"这个贫农大 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 中坚, 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 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 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 村的革命状态, 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 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农会的领导权。"[2](21) 这样,毛泽东不仅以阶级斗争的视角看到了一个立体 的农村,而且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进一步具体化了。

至于土地分配的手段,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曾经向 中共指出:"要想引导群众加入斗争,只有在乡村实行 土地革命,在城市满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才有 可能。毅然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 重新分配土地, 没 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产,禁止高利契 约,取消贫农受重利盘剥之债务,大减赋税,课税摊 派于富豪之家等等。"[14](424)在这里,共产国际强调的 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对中小地主的土地问题并没 有更多的指示。但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大特点即是 大地主少而中小地主多。如果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最终将导致"耕者无其田"之结果,从而无法鼓动农 民起来支持革命。对此,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强 调道: "1.大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 主中地主。我意可以五十亩为限, 五十亩以上不管肥 田瘦田通通没收。2.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 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 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 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 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安民。3.自耕农问题。富农中 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 所以要确定方 向。"[6](73)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 分配方案,但从中亦可看出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理解。 除此之外,彼此之间在筹款、征集新兵等革命动员问 题上也有诸多的不同。像筹款的问题, 共产国际代表 罗易曾经认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会加深财政危 机,相反,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大量没收的地产和寺院的土地可以作为发行钞票的保 证金。德国地租银行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中国 革命政府的财政困难。 …… 在中国, 革命政权可以用 消灭封建反动势力的办法来摆脱其财政困难。"[14](258) 实际上,这种以保证金、地租来筹款的方式与毛泽东 以"打土豪"之筹款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在扩大 军队与肃反等方面,这里限于篇幅的关系就不作—— 的介绍了。

我们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时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动员理论,如动员的手段,动员的内容等。但是,这种借鉴并不是完全的照搬照抄,相反,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对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动员理论给予了创造性的发展。

 $\equiv$ 

应该来说,毛泽东这一时期虽然有了一个如何在 中国进行革命动员的总体思想,但由于当时革命的不 够深入,他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至于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农村,但对其中的复 杂性认识不足。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拉 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时谈到:"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 看清农村。……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 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 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 村不是平面的, 而是有富的, 有贫的, 也有最贫的, 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15](306-307) 他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之中,不仅地主有大中小之分, 而且农民中亦有佃农、自耕农、雇农、贫农之分。而 在广义的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情 绪,只需共产党加以适当的宣传,广大的农村中就会 产生一种"干柴烈火"般的效果[2](102)。但是,实际情 形却并非如此。在当时中国的农村,地主与农民之间 虽然存在着广泛的斗争,但同时又有诸多的纽带将他 们连成一个整体。如家族观念,就是这样一条纽带。 我们知道,经过数百千年来的发展,家族观念在中国 农民的头脑中已是根深蒂固,并使同族的内部保持着 极强的内聚力。当共产党的革命转入到农村之后,毛 泽东随即发现:"一般农民虽然十分勇敢,但均在宗族 关系之下去作斗争,很少爆发乡村的阶级斗争。"[16](139) 经过多次的实践之后,他亦无奈地感叹道:"非有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 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 家族主义 不能战胜。"[2](69)除家族观念之外,还有同籍观念。毛 泽东曾经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土籍的本 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 的界限, 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 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 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 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 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2](74)这种由户籍差 别而引起的土客籍斗争,往往容易模糊了农村中的阶 级界限,从而影响到农村阶级斗争的开展。

第二,他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与激情,但对农民的理性认识还不够。自 1926年7月北伐军以武力驱逐湖南军阀以来,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就使当地农会的会员激增到 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 1000万<sup>[2](13)</sup>。而且,各地农民广泛行动起来,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打倒地主及其武装,而且在破除迷信、维护治安、政治宣传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此,毛泽东曾乐观地预言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

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 朝着解放的路 上迅跑。"[2](13)在这里,毛泽东忽视了当时湖南农民运 动兴起的特殊背景,即国民革命军在该省的军事胜利。 事实上, 在社会日趋武化的旧中国, 军事上的胜利对 革命的开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像 1927年9月, 夏明 翰就曾经向任弼时抱怨道:"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 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 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 了农民的脑筋。"<sup>[17](25)</sup>1928年12月,福建省委向中央 的报告道:"农民对我们很坏,要撵农运同志出北乡之 外,恐怕因我们引起了剿乡的危险。"[18] (P91)与此同时, 毛泽东所领导的红四军每到一地,也是经常遇到"群 众冷冷清清"[2](78)的场景。相反,在红军取得了若干 胜利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 [2](69)实际上,上述现象是由农民固有的理性所决定的。 因此,要实现对农民的政治动员,还必须免除他们参 加革命的后顾之忧,并将其参加革命的成本降至最低。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是在以后革命实践中逐渐实 现的。

第三,他看到了革命中暴力的一面,却对其中的 部分野蛮行为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马克思认为,暴 力革命不仅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而 且"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9](819)。为此,他还在《共 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要以暴力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 会制度。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亦表示完全的赞同。他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曾热情地赞扬道: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 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 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 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 怖现象。"[2](16)对于上述"恐怖"现象,毛泽东感到了 "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2](16)。但应该指出的是,农 民的上述行为总体上却是落后的、野蛮的。特别是在 落后的革命环境下, 鼓励上述行为往往会给革命带来 相当的负面影响。像湘赣苏区,仅1932年初被驱逐的 豪绅、地主及其家属即在 5000 人以上[20](44), 而被杀 者亦不在少数。像酃县,16岁~30岁的地主豪绅及其 家属,只要是壮丁,无论男女都被杀掉了[21](383)。这不 仅影响到苏区群众的革命情绪,同时也为国统区进行 丑化苏区的宣传提供了藉口,从而使共产党在政治上 逐渐陷于被动。当然,这也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 剿"战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通过这一时期的思考与探索,毛泽东 初步构建了一个关于革命动员的模式。至于这一模式, 它既有苏俄革命的色彩的一面,又有他对中国国情深刻理解的一面。虽然,他这一时期所形成的革命动员思想对之后的苏维埃革命影响很大,但党内对此最初的回应并不积极,相反,党内的主流认识与它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一分歧,直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南昌、秋收与广州等三大城市起义惨遭失败之后才逐渐得到了弥合。

## 参考文献:

- [1] 中野实. 革命[M].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4] 高熙.中国农民运动纪事 [M].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8.
-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 [6] 八七会议 [C].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 [7] 陈独秀.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A].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C].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 [8] 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及经费问题[A].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9] 毛泽东. 致罗璈阶信(1920 年 11 月 25 日)[A].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C].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0.
- [10] 罗荣桓.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A]. 革命斗争回忆录 (上)[C].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9.
- [11]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 [12]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 (1905 年 6~7 月)[A]. 列宁选集(第一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 [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1923 年 5 月)[A].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19~1928)第一辑[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4]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C].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5] 毛泽东.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 年 9 月 25 日与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A].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 [16] 江西省委给中央报告 (1928 年 4 月 15 日)[A]. 江西党史资料 (第 4 辑)[C]. 南昌: 内部发行, 1987.
- [17] 任弼时.任弼时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 (1927年9月27日)[A].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上)[C]. 北京: 中共党 史资料出版社, 1987.
- [18]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崇安问题的报告 (1928 年 12 月)[A]. 闽浙 皖赣革命根据地 (上)[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1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9 年)[A]. 马

-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0] 湘赣苏区省委报告 (1932年1月12日)[J]. 红旗周报, 1932, (31): 44.
- [21] 中共湘赣省委报告 (1932 年 4 月 11 日)[A]. 湘赣革命根据地 史料选编 (上)[C].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Thoughts on Mao Zedong's mobilization thought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time

## YANG Huiqing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Nanchang 33000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time, Mao Zedong explored the China's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questions diligently according to Marxism-Leninism theory and initially formed mobilization thought which take the class struggle,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as the method, and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recruit, funds collection as well as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suppression as the main content. The mobilization thought, manifested not only that Mao Zedong had creatively developed Marxism-Leninism, but also that he thoroughly understood the national condition of China. But he still had many immature views on the mobilization question because the revolution was carried insufficiently at that time.

keywords: the Great Revolution time; Mao Zedong; mobilization thought

[编辑: 颜关明]

(上接第52页)

## Influence of interest groups on change of struct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 WU Jinqun

(Economic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 political sphere, people can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because of some special mechanisms. Main interest groups which affect the chang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political sphere are as follows: governments and bureaucrats, shareholders, managers, workers, bankers, etc. From static point of view, the changing direc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decided by strong interest groups. From dynamic point of view, the chang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n evolution of the game equilibrium among interest groups. So, the chang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simple economic evolution, but also a process and result of political games.

Key words: interest group; structu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nge

[编辑: 颜关明]